

观念读本

idea

20

大家西学

大学二十讲

杨东平编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反应堆

University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西学

University

大学二十讲

杨东平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二十讲 / 杨东平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1

(大家西学)

ISBN 978-7-201-05958-7

I. 大… II. 杨… III. 高等教育—研究—西方国家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040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大学二十讲

编 者 杨东平

责任编辑 沈海涛

特约编辑 董曦阳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邮 箱 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1-05958-7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我们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包括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不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的“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 Society 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年7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杨东平

1852年，牛津大学的神学家、后来成为英国红衣主教的纽曼，写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探讨大学的专著《大学的理念》。由此，关于大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大学校长、高等教育专家，也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这并不是完全出于“学术兴趣”，主要还是因为近世以来大学教育——乃至人类的文化生产、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机。

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近百年的事。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远离尘嚣、修道院式的小型学院，被喻为“僧侣的村庄”。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附庸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给自足的学术机构，在围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学术探索 and 知识传授活动，是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纽曼所坚持的，正是这种欧洲古典大学的传统，也是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关于大学教育的主流认识。他从大学（university）的逻辑起点上判定大学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而非狭隘的专业知识。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在那个时代，大学的职能是清晰和单一的，是传授知识而非发现知识。纽曼揶揄

地发问：“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

然而，那时的欧洲大学已经不是古典人文主义的一统天下。从培根、斯宾塞开始，关于什么是有用的知识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挟工业革命的强劲动力，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的涓涓细流逐渐汹涌澎湃，与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成二水分流之势。纽曼虽然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积极的反应，但揭开了这场持续至今的关于大学之道的争论。

正是从那时起，大学开始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和加速发展的过程。英式传统大学的理想逐渐黯淡，新的明星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它是由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奠定的。在教学之外，洪堡确立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功能，使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他奠定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价值，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准则。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德国大学的模式漂洋过海，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结合，由“赠地学院”生长出的为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打破了学院和社会的藩篱。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成为社会服务的“超市”和“加油站”。布鲁贝克高度评价了这一变化：上大学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向它探求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还包括对人类命运的信念，包括关于如何区分善恶、真理和谬误之类的问题。“在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但今天，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让位给全体学者。”因为“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现代世界中还没有什么社团比大学学者社团犯的错误更少”。通过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

社会“世俗的教会”。^①

在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所发生的变化不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关于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力量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和方式等，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题。

身兼教育家和官员的洪堡，比别人更早、更清晰地意识到大学的这一重危机。他强调大学、科学与国家和政治的本质区别，认为大学应当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应当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明确自身对大学所具的天然和潜在的危害，不试图将大学的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洪堡提出：

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②

他并且提供了处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类似准则。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而非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③

20 世纪上半叶的特殊经历，使洪堡的这一理想遭遇严重的挫折和拷问。海德格尔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突出了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将大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考虑到他这篇洋溢着国家主义精神的演讲正值纳粹势力勃兴之时，他后来之备受争议，就不难理解了。大数学家赫尔曼·外尔更为清醒、冷静地看待德国大学的使命和

①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30—134页。

② 转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③ 同上，第32页。

国家的命运。他揭示了大学纳粹化的必然后果：当大学的权威被公然否认和摧毁时，政府的权威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伴随大学的扩张和变革，大学精神的衰微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话题。爱因斯坦 1931 年所作的演讲，显示了他洞察历史的先见之明。核武器加害于人类的惨烈现实，以及一大批科学家沦为纳粹帮凶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悟没有灵魂的科学教育之危险。如何使科学技术能够造福于人类而非造福于人类，成为文明社会和大学亟待解决的共同使命。

“教育的钟摆”朝向了人文主义的方向，古希腊的大学理想重放光芒。如同弥尔顿、杰斐逊所珍视的，源自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文艺复兴之后“绅士教育”的精神，教育要培养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尤其是有教养的人，通过以“七艺”课程为主的广博的学习，获得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幸福。如同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也就是精神的培养，要改善学生的人性。学生仅仅获得知识是不够的，教育的使命在于使其成为“全人”。科南特的“要素主义”反对以儿童经验为中心的教学，主张将“文化的共同要素”作为课程的核心，使经过检验的社会遗产在新生的一代得以再现和传递。1945 年，科南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提供了《自由社会的通才教育》的著名报告，开启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变革。赫钦斯的“永恒主义”则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因此教育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也是不变的。它从“永恒的真理”中引申出“永恒的学科”，推动了以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的“伟大著作”为主的经典阅读。

“保卫自由教育”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口号。事实上，所谓的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博雅教育等，来自同一个英语词汇 liberal education。时移势易，古希腊贵族的“博雅教育”转义为培养现代社会具有自由博大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自由教育”，而在以科技和职业教育为主的时代，它不可避免地被转化为一种更具操作性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曰普通教育）。大学课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此起彼伏，从未停歇。

在这一争论背后，有一个为人忽视的事实，它是由 C. P. 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揭示的：知识分子已经分裂成两个语言不通、志趣不同、互相鄙视、不相往来的群体：工程师—科学家集团和文科知识分子集团。这种分裂对形成统一的知识、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人格构成真正的威胁。尽管如此，怀特海、外尔作为数学家，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对人文和艺术教育的高度推崇，成为科学和人文未必绝缘的强有力的证明。如同罗素所言，教育除了直接实用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

“无须为传统的课程辩护。其实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广泛的考虑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他们的狂热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① 杜威强烈地反对在前科学时代形成的关于自由教育的概念。在《民主信仰与教育》和《关于文学院的问题》文中，他认为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应将学科划分为高贵的、“学术的”和低级的、不自由的，真正的问题是“使现在社会所必需的技术科目具有一个人文的方向”，即促成“科学的人文化”。^②

类似的，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大学的教学并不拒绝职业教育，“每一个时代的大学都必须满足实用职业的要求……但是大学却带来一个崭新的观念，那就是把实用知识收纳在整体的知识范围之中”。^③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探讨了“为自由教育奠定实用主义基础”的途径，以及把重点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转向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合理性，“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④

关于科学的人文化、融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努力即便在自由教育的框架中也并非水火不容。科南特在《美国师范教育》一书中说：对千百年来人们所珍视的博雅教育的概念，“它本质上不属于一种课程计

① 引自刘硕良主编《哲学·数学·文学》，江燕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369页。

② 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③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176页。

④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民选译，王承绪校，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划或范型，假如我们把它看做是一种过程和志向，我们才会接近于标准”，“博雅教育的特征，与其说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不如说在于它所追求的东西；它的目的在于扩大理解力，发展对事实的尊重心，增强合乎情理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进行博雅教育的过程不限于教室，也不以所学习的科目或有助于学习这些科目的种种经验来定界限。它所追求的是在于造就一种有学识的、好探问的、善于判断的心理习惯，而不是在于造就某种特殊的才能”。^①

事实上，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和制衡中，“教育的钟摆”并未真正偏斜，教育的人文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从未真正丧失。大学仍然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 and 发现、实现和思考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②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不难看到，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曾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我国正在面临的。由于特殊的发展路径，我国的这些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更为复杂，迫切需要重温大学精神，重建大学的理想和现代大学制度。愿西方先哲的智慧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校准坐标，指引我们在新世纪的出发。

① 《科南特教育论著选》，陈友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47—248页。

②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版权声明

我社编辑出版的书中部分文字，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著作权，我方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3 室

邮编：100083

电话：(010) 82357056 (57, 58) —230 / 229

传真：(010) 82357055